



“党的骆驼”黄文杰：无限忠诚的战士



黄文杰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大坪镇上大塘村，一座“三堂二横”泥砖瓦结构的房子依山傍河而建。这座始建于清朝的房屋，是革命烈士黄文杰的故居。不久前，大坪中心小学的一群少先队员在这里上了一堂特殊的课。隔

着数十年的光阴，革命先辈为家国、民族舍生忘死的身影跃然眼前。

1902年10月6日，黄文杰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大坪区(今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学期间他曾多次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查禁日货、宣传爱国思想，是学校中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此后，他以优异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由军校中共组织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因成绩优异、精通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的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黄文杰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此后，他辗转多地，历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之一等，为开展党的组织工作、恢复建设中共地方组织、指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不懈努力。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次日惠州沦陷，广州形势危急。南方局特派黄文杰到广州指导广东省委应对这一事变。黄文杰当机立断，采取应急措施，作出“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广州办

事处迁往粤北”“广州市委留下组织部部长陆新率领部分党员坚持地下斗争”等决定。此后，他日夜操劳落实，直至日军占领广州前夕才撤离。

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西跑、忘我工作的黄文杰，1938年冬发现自己患了肺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刚有所好转，他又毅然接受周恩来布置的任务，长途跋涉抵达重庆，在南方局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其间，他认真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重庆主持举办党员训练班，并参与叶剑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翻译了不少苏联文章供叶剑英等人讲课参考。他还撰写政论文章，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以“绚文”“烂光”等笔名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到1939年上半年，南方局领导的各地党组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党员人数发展到8万多人。

黄文杰为党的事业埋头苦干，生病的事连妻子也不知晓。1939年7月，因躲避日机轰炸，他在防空洞里受了凉，发高烧，抢救无效，于8月不幸

逝世，终年37岁。

黄文杰逝世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墓地。“他是我们的骆驼，从来没有计较到他所担负的轻重，而能任重致远的渡过艰难的沙漠。像这样一个人，恰恰死在革命艰难的时代，实在是革命的损失。”在《悼黄文杰同志的死》一文中，叶剑英动情写道。

1983年，民政部批准黄文杰为革命烈士。2020年9月，黄文杰被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在黄文杰的故乡，他的事迹被深深铭记。2021年6月，当地对黄文杰故居进行修缮，并在故居基础上设置了“黄文杰烈士事迹陈列展”，布置了黄文杰的雕像、主题浮雕墙、文字墙和相关实物等。

梅州兴宁大坪镇党委宣传委员黄凯波介绍，如今，故居已经成为当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我们会继续深挖英烈的革命事迹，让更多人了解他忠诚无私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据新华社)

常德会战：从与城共存亡到与城共兴荣

在湖南省常德市，常德博物馆常德会战展厅入口处，一面墙上布满了十几双由当年抗战老兵留下的手印，无声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岁月。参观的人们不时驻足凝视，陷入沉思。

1943年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迫转为守势。为挽回战争颓势，鄂西会战，日军策划了“常德歼灭作战”。

“日军发动‘常德歼灭作战’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此牵制可能参加远征军的中国机动兵力，策应其在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并劫夺‘洞庭粮仓’常德地区的战略物资，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常德博物馆副馆长龙朝彬说。

1943年11月初，日军沿东起湖南华容、西至湖北荆州对岸弥陀寺一线，对中国守军展开攻击。从地理位置看，地处平原的常德城易攻难

守，加上前期日军已将守城部队与外线作战中国军队的联系切断，导致国民革命军第74军第57师只得孤守常德。

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第57师官兵与武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杀。攻城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四面围攻常德，并多次施用毒气。中国守军“有一墙守一墙、有一壕守一壕、有一坑守一坑”，在常德城郊、城垣、城巷与侵略者血战。因弹尽粮绝，援军又迟迟未至，孤城常德于12月3日失守。但几天后，第57师官兵百余人从第九战区赶至的援军第58军新11师一起，克复常德城。

“整个会战中，常德军民一心，誓与城共存亡。”龙朝彬说，会战中，中国官兵伤亡数万人。其中，牺牲的将领有彭士量、许国璋、孙明瑾、柴意新等。战前，常德民众踊跃参与备战，除

捐粮捐棉之外，120多名当地泥木工组成“战时工程服务队”协助第57师修碉堡、挖战壕，许多民众还在战时主动传递战报、运输弹药、送茶送饭、抢救伤员。

龙朝彬表示，常德会战中中国守军坚守时间之长、官兵牺牲之惨烈，是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少见的。会战给日军以相当的损伤消耗，较沉重地打击了进犯的日军，部分地破坏了日军南下的作战企图，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常德会战后，彼时的常德全城几乎被夷为平地，仅剩几栋还有完整房顶的建筑。而如今，常德已蜕变为“国家园林城市”和“国际湿地城市”；作为鱼米之乡，常德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已连续21年保持湖南全省第一；经济总量位居湖南省前列。

常德城区里，当年会战的遗迹白

马湖碉堡、城壕湾碉堡等，已和繁华的商圈、秀美的公园、宁静的校园融为一体；损毁殆尽的老西门，经过重建改造后焕然一新，成为常德新地标。

“作为常德城市的建设者之一，我有一种与城共兴荣的自豪感。”常德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树高如今已年过六旬，曾在常德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多年，参与过涉及数十万群众的常德市旧城改造。

据了解，常德市成立了常德会战研究会、常德抗战文化研究会等多个民间组织，积极搜集抗战史料、传播抗战文化，其中，常德抗战文化研究会创建的常德抗战文化交流中心每年接待海内外参观者达数十万人次。刘树高说：“常德会战体现的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永远传承弘扬。”

(据新华社)

邹韬奋创办《抗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激发全国人民抵御外侮热情和动员投身抗日救亡行动中，邹韬奋即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并自任主编。刊物初为16开8页，后固定为12页，逢3、6、9日出版。同年9月9日在上海租界当局干涉下从第7期开始更名为《抵抗》，外埠发行仍沿用原名；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的同年12月16日出版的第27期恢复《抗战》原名到第29期。1937年11月23日邹韬奋等人在武汉继续出版《抗战》第30期，出至1938年7月3日第86期后与沈钧儒任社长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刊名为《全民抗战》。《抗战》三日刊从1937年8月创刊到1938年7月合并存在时间11个月。

作为时事政论性期刊，邹韬奋对《抗战》三日刊进行了精心编辑，在创刊号上明确刊物的任务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在刊物封面设计上用心编排，封面上方正中以手写体“抗战”二字为刊名，刊头左侧标注“要目”，设有战局分析、专论时评、各地通讯、杂感随笔、战时常识、诗歌歌曲、地图漫画、读者来信等栏目。

在刊物组稿上，邹韬奋除自己写稿(如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上海抗战的重要意义》《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汉奸问题》等190多篇文章)外，还专门组成刊物撰稿的主要撰稿人队伍，胡愈之、郭沫若、艾思奇、杜重远等人都参与其中，并约请宋庆龄、冯玉祥、沈钧儒、史良、章乃器、茅盾、冼星海、臧克家、叶剑英、潘汉年等社会知名人士提供稿件。

在刊物内容选择上，邹韬奋注意将内容的可读性与版面的可视性有机结合，聚焦国内外战时局分析和宣传动员民众抗日，并以当时比较少见的插图形式活跃版面；在刊载全面抗战和反映民众救亡图存情况的同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刊登《朱德等就抗战通电——坚决抗战众志成城》《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等多篇文章。

《抗战》三日刊一经推出，就赢得众多的读者。刊物坚持全民族抗战的鲜明立场，发出团结御侮抗战到底的时代呐喊，使得它成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宣传抗日救亡的著名刊物，在推动全民抗战局面形成巩固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据《人民政协报》)

鲁迅的包容心

1926年年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一职，前往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姓张的学生，对鲁迅“顶礼膜拜”，不管鲁迅走到哪里，他都要跟到哪里，简直成了鲁迅的影子。鲁迅对此虽然有些无奈，但并没有说对方什么。

1927年8月，鲁迅离开广州奔赴上海，他以为终于可以摆脱那位“迷弟”。不料，对方不但跟着他一起来到上海，同时还希望鲁迅能收留自己，并且“管吃管住”。鲁迅有点哭笑不得，不过仍然勉强答应下来。此时，这位同学看鲁迅处处照顾自己，便毫不客气地将女朋友叫过来一起住。除了要求鲁迅为他们两人提供衣食住行外，还要求“一定要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为了那位张姓同学的前途着想，一向不爱求人的鲁迅“还是出门找了几个熟人”。遗憾的是，那几个熟人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话。走投无路之际，鲁迅找到好友郁达夫，让他“无论如何，为这位青年去谋一职，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的工作”。看到鲁迅无可奈何的神情，郁达夫表示一定尽力而为。

很快，郁达夫向现代书局说好此事，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雇佣这位青年。然而就在此时，那位青年却又觉得跟着鲁迅“看不到任何前途”，最后带着女友头也不回地“脱离鲁迅而走了”。

事后有人问鲁迅，很明显这个年轻人是利用了你的同情心欺骗了你，你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帮助对方？鲁迅平静地表示，当年轻人自尊心很强，不要轻易批评他们。再说对方也没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帮他们一把又如何呢？

(据《北京青年报》)

张謇与中国第一家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它位于江苏南通，始建于1905年，比1912年开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早7年，比1925年对外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早20年。

说起南通博物苑，不能不说的建设者张謇。张謇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7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

张謇的一生，干了很多大事。1894年，已经41岁的张謇，第五次进京应试，高中状元，授六品翰林院修撰。此后，成为翁同龢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极力主战。1895年，张謇历经艰辛，创办了大生纱厂。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起草了退位诏书。南京政府成立后，张謇担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张謇一生创办了100多家企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张謇还创办了40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通州师范学校(扬州大学前身)、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南通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等。

1903年5月，张謇到日本参加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这次博览会的展陈面积有9万多平方米，场面之大、展品之多、参观者之众，令张謇等人极为震撼。回国后，张謇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学部请设博览馆议》，提议建立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同时他还上书张之洞《上海南皮相国请京建设帝国博物馆议》，希望帮助说服朝廷，开展博物馆建设。当时日俄正在中国领土上开战，国内的反清潮流也开始涌动，所以根本没人理睬张謇这个举。

眼看奏折和上书都石沉大海，张謇决定自己动手在家乡建一家博物馆。1905年开始设计和施工，1906年建成了第一个展馆，取名为南通博物苑。据1914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该馆当时共收录文物和标本2973件。1933年增至3605件。大都是寺院和各地人士捐赠，也有部分是收购的。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骨角器，汉代的煎盐工具盘铁等，均属珍贵文物。

现在南通博物苑，已有历史文物和自然标本藏品近5万件，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联谊报》)

倘若时光倒流300年，我们或许能在南京随园的溪流边遇见一位白须老者——袁枚正执卷漫步，时而俯观游鱼，时而仰听鸟鸣。这位辞官隐居的文人在他的园林里找到了安顿身心的所在，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关于“情绪价值”的早期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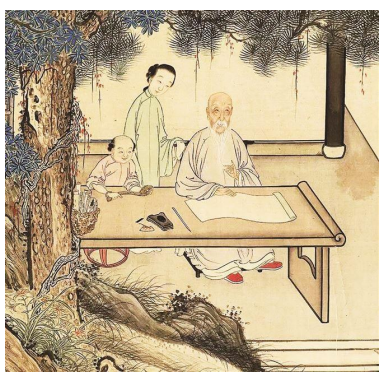
当今社会，“情绪价值”已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刚需。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年轻人选择“为情绪价值或兴趣买单”。然而，若以为情绪消费只是现代人的专属，那就大错特错了。古人在为自己寻找快乐、慰藉和心灵安宁这件事上，堪称“资深玩家”。他们的“情绪消费”，不仅风雅，而且成果能流传千古。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古人的“朋友圈”，看看他们如何高级地“取悦自己”。

▶《随园图卷》。



修园林 开雅集 瓦肆观演

看看古人如何“取悦自己”



《随园湖楼请业图》中的袁枚。



《随园食单》。

综合业务部主任孔令琦告诉记者，这座园林的命运与一位文人紧密相连——袁枚。在购入废园后，他将其改名为“随园”，寓意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在这里，袁枚度过了人生大半时光，创作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等著作，更建造了藏书三十万册的“书仓”。

随园提供的情绪价值远非金钱能衡量。它是一片让心灵得以休憩的净土，一处让创造力自由生长的沃土。对袁枚而言，这座园林的投资回报，不在金银，而在那些无法量化的精神富足与心灵宁静。

雅集 古风版的“顶流线下社交”

如果说园林是文人安顿自我的静态空间，那么雅集就是他们寻求共鸣的动态盛宴。古代文人愿意为这种精神共鸣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

西晋石崇的金谷雅集开了先河。凭借强大的“钞能力”，他在洛阳金谷涧中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人聚会，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曹道衡、沈玉成在《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评论：“石崇金谷之集，为西晋文人聚会赋诗规模最大者。”

而真正将雅集推向巅峰的，是王羲之的兰亭之会。永和九年，42位文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现场诞生的37首诗编成《兰亭集》，王羲之为此写

就的序文，更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到了明清，江南私家园林成为雅集的“顶配场地”。而袁枚的随园，就是清代的“网红打卡地”。他在园里张灯结彩，广发“英雄帖”，金陵城的文化名流纷至沓来。用今天的话说，他就是一位顶级“主理人”。他们为雅集花钱花时间，买的是什么？是“我懂你”的确认感，是思想碰撞的愉悦。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是最高质量的“圈层社交”和“精神充电”。

瓦肆与祈福 古人的“即时快乐”与“考前焦虑”

古人的情绪消费不仅存在于文人雅士的精致生活，也渗透在市井百姓的日常之中。

在宋代都城，一种名为“瓦肆”的大型综艺场所满足了市民的“即时快乐”需求。在这种类似现代剧院的场所，观众买票入场，观看各种表演。《东京梦华录》记载：“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这种热闹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艺人们必须不断创新、提升技艺，才能在瓦肆立足。而观众的回应也极其热情，《南宋志传》记载，艺人表演后持盘讨赏时，“豪客、官家各争赏赐”，场面不逊于今日直播间的“打赏”热潮。

另一方面，在面对人生重大关卡

时，古人也需要情绪出口。对科举士子而言，南京的梅将军庙和关帝庙成为他们“缓解焦虑”的地方。士子们祭拜与《尚书》有关的梅颺，祈求科场顺利；在关帝庙求签问卜，寻求心理安慰。

1818年，士子金镇在关帝庙求到“水到渠成听自然”的签文，后来他三场考试的座号都带“水”字，最终中举。这种“灵验”传说，本质上是一场文字游戏，是“关心则乱”的心理投射。如同近年考试时家长穿旗袍求“旗开得胜”，都是通过某种仪式获取安心。

从袁枚的随园到王羲之的兰亭，从热闹的瓦肆到安静的庙宇，古人以各种方式安顿心灵，为情绪价值买单。这些行为背后，是人类共通的情感需求——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对知音共鸣的寻求，对焦虑压力的疏解。

与今人不同的是，古人的情绪消费往往创造出更持久的文化价值。一座园林、一帖书法、一次雅集，不仅抚慰了当时的心灵，更成为穿越时空的文化遗产。

站在博物馆里，看着《随园图卷》中的亭台楼阁，我们不禁想象：袁枚曾计算过修缮园林的情感回报率？或许他早已明白，有些价值无法用银两衡量，却能滋养心灵，穿越时空，直至今日仍让我们心向往之。(据《金陵晚报》)

园林 古人打造的“终极治愈空间”

对古代文人而言，园林远不只是物理居所，更是精心营造的精神桃源，是安顿焦虑、滋养心灵的空间。

南京历史上有许多名园，如瞻园、愚园、煦园，但其中故事最多的随园，如今却只能从《随园图卷》等文物中窥见一斑。“随园可以说是清代南京故事最多的一座园林。”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